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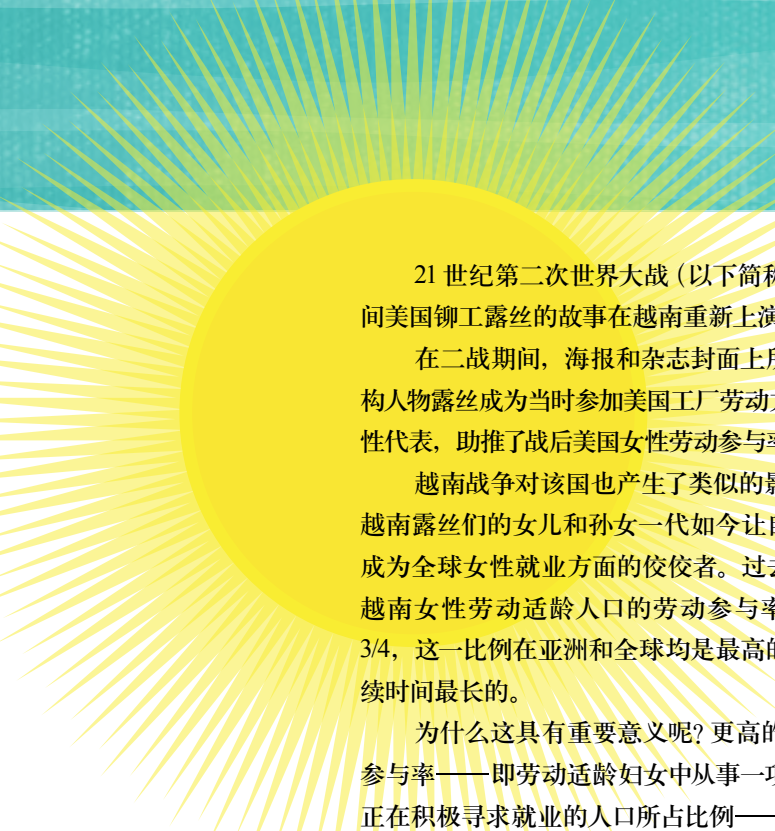


亚洲 职业女性

亚洲劳动力大军中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越南尤为突出

安嘎纳·巴纳吉、阿尔贝·戈琼巴腊吉、萨恩迪乐·赫拉茨赫瓦尤、安·凡乐





21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期间美国铆工露丝的故事在越南重新上演。

在二战期间，海报和杂志封面上所出现的虚构人物露丝成为当时参加美国工厂劳动力大军的女性代表，助推了战后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越南战争对该国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因此越南露丝们的女儿和孙女一代如今让自己的国家成为全球女性就业方面的佼佼者。过去 20 年来，越南女性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约 3/4，这一比例在亚洲和全球均是最高，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

为什么这具有重要意义呢？更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即劳动适龄妇女中从事一项工作或者正在积极寻求就业的人口所占比例——意味着参与生产性劳动的人口增加，从而能提升经济体的增长潜力。这可以弥补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因为老龄化使劳动力规模缩减并降低了增长率。

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其人口数量占全球总人口的 60%，但目前亚洲正在快速老龄化。因此，让更多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对于加强亚洲的经济活力并确保未来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也使得女性能够实现经济自主和其他各种愿景。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18 年一份题为“平等的力量：亚太地区性别平等之路”的报告预测，到 2025 年，该地区性别平等将使年度 GDP 整体提升 12%，即增加 4.5 万亿美元。

一些研究人员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劳动力人口中女性比例的提高以及女性提升至重要岗位有助于促进收入平等，实现经济多元化并推动企业利润率和效率的提升。

呈现上升趋势

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亚洲呈上升趋势，许多其他国家正在追赶越南的水平。平均而言，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亚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约 6 个百分点（见图 1），与发达西方经济体的差距不是很大（IMF，2018）。我们即将公开的论文探讨了亚洲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发展变化。

整体情况在不断改善，这体现了亚洲女性劳

动参与率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表现更好的国家靠拢。

在 1996 年至 2016 年期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参与率较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将该比例平均提高了大约 12 个百分点。在过去的 10 年中，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新加坡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将参与率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以上，与瑞典等国的增长水平齐平，瑞典是发达经济体中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和韩国在既往参与率停滞不前或下降的基础上也实现了些许提升。近年来，上述各国取得的所有进步提高了亚太地区的平均女性劳动参与率。

尽管亚洲女性劳动参与率总体上升，但是各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在不断增加。一些国家未能跟上亚洲其他地区的发展脚步。

亚洲各地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差异不断扩大，主要是由于一开始参与率就低的国家的参与率下降或者停滞，尤其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中国和泰国的参与率尽管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也有所下降。

越南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其高水平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超越了西方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国家（见图 2）。同时，20 多年以来，该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保持在 70% 上下——如此良好的表现，即便发达经济体也是无可比拟的。

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驱动因素

要了解亚洲表现更为突出的原因，需确定其在哪些领域取得了最大进步，这一点很重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年纪较大的工作者所占比例增加，将会降低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因为年长的工作者在劳动力大军中的活跃程度往往比较低。但在亚洲，尽管老龄化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年龄介于 25 岁至 54 岁之间的青壮年女性工作者的参与率有所提高，这是因为年轻工作者（包括男性和女性）入学率的提高推迟了其加入劳动力大军的时间（Anh and others，即将发表）。

总体而言，上述趋势几乎在所有亚洲国家均存在，仅有少数例外情况——尤其是中国、印度和泰国，在这些国家中，青壮年女性工作者参与

劳动的情况有所减弱。

经济周期对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会产生很大影响。增速减缓或者经济衰退会提高失业率，这将导致工作者因丧失信心或技能落伍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推迟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以待经济恢复。

近年来，亚洲经济体从强劲的增长中获益，这为女性工作者参与劳动提供了支持，同时也抵消了老龄化的影响。在此方面，亚洲的经验有别于西方发达经济体，后者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同时接踵而至的经济滑坡也拉低了女性劳动参与率，从而加剧了老龄化所产生的压力 (IMF, 2018)。

但是，增长率和老龄化不能完全解释亚洲劳动参与率方面的变化。经济体中的结构性转变以及家庭友好型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结构和个人特征息息相关，同时，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制度不仅对总体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也对女性工作者产生了特定的影响。这些因素影响人们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决策，同时也会影响雇主的雇用决策。相关驱动因素包括：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加平等的劳动权利、较低的青少年生育率、儿童保育的可得性和经济可承受性，以及影响女性参与的文化态度。

相关政策的影响可能会由于经济体结构以及所处经济和制度发展阶段而存在差异。例如，在更为发达的经济体中，城市化和受高等教育的程度常常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关，因为城市服务行业的就业岗位对女性的技能要求都较高。上述因素与低收入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性较弱，因为在这些国家农村（农业）中的非正规就业率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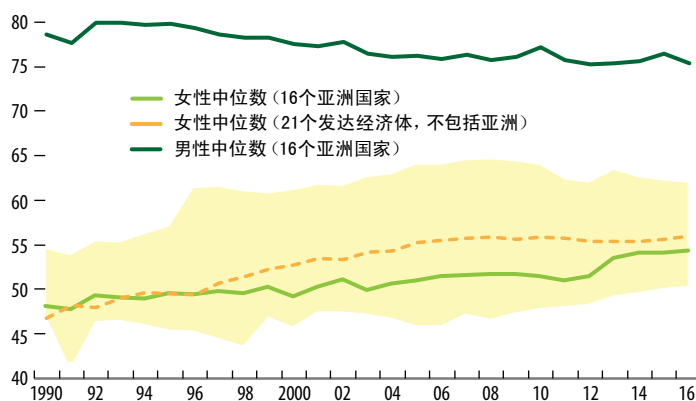
本文所探讨的这些亚洲国家覆盖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备不同劳动力市场禀赋以及不同政策和制度设置的各类国家。一般而言，由于某些因素仅对规模较小的国家产生影响，所以在解释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方面，其统计学意义不大。

在亚洲经济体中，相对于工业行业，规模较大的服务行业（其中包括公共部门）以及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是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关系最为

图1
呈现逐步上升趋势

亚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正在不断提高，接近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但各国之间的差异有所扩大。

(劳动参与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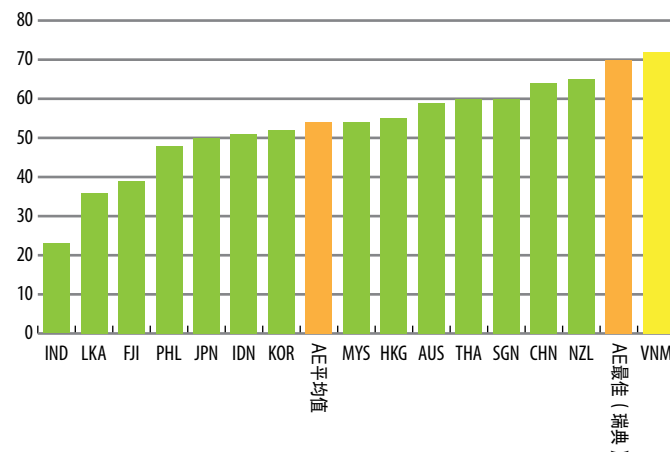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不包括如下国家的数据：柬埔寨（1990—1991年，2015—2016年）；中国（2011—2016年）；斐济（1990—1995年）；印度（1990年，2013—2016年）；越南（1990—1995年）。阴影面积表示四分位差。

图2
越南表现突出

越南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超过了西方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最优的国家。

(女性劳动参与率，最近，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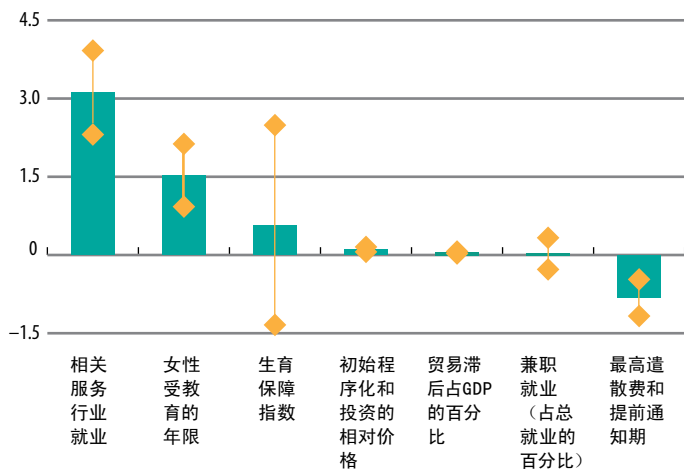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图中数据为2016年的数据。柬埔寨、中国和印度的最新数据年份分别为2014年、2010年和2012年。AE=21个发达经济体，不包括亚洲。图中的数据标签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图3
激励因素

受教育水平和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增加是亚洲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的部分主要原因。

(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平均影响, 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条形代表女性劳动参与率（25—54岁）在变量提高一个单位之后的预估变化。竖线表示90%的置信区间。相关的回归分析均包括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

密切的因素（见图3）。鉴于亚洲国家的多样性，其经济的开放性（通过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以及城市化的速度（未显示）一般而言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影响较小。

尽管自动化（或者程序化）对一些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种情况并非普遍存在于整个亚洲。这是因为，在某些国家中，程序化程度相对较低（例如，鉴于农业所占的份额较高），同时自动化的成本较高。

针对女性劳动力所面临的特定限制而量身定制的家庭友好型政策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生育保障、儿童保育以及兼职就业等。但是，几个亚洲国家中所存在的数据缺口以及庞大的非正规行业限制了其总体影响的规模。此外，家庭导向型政策的效果取决于依法实施强制规定的制度的能力，而不同亚洲国家在这方面存在差异。

最后，劳动力市场刚性化造成企业难以解雇员工，这对于雇主做出雇用女性工作者的决策产生了寒蝉效应。

越南的特殊情况

越南是如何做到在几十年里保持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呢？

尽管战争使越南成为一个特殊案例，但是该国的经验对于想要推动女性劳动参与率增长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具有借鉴意义。由于越南的政策选择推动了女性就业，因此这一初期政策被长期沿用下来，包括：经济改革以及大力推进强调性别平等的教育发展。

根据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的由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克劳迪娅·奥利维蒂（Claudia Olivetti）撰写的文章，越南战争助涨了女性劳动参与率，这与美国在二战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相似的。

越南战争导致男性人口相对于女性人口急剧下降，尤其是青壮年人口（见图4）。由于1986年经济革新之后经济开始增长，而可获得的劳动力主要为女性，所以大量的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也就不不足为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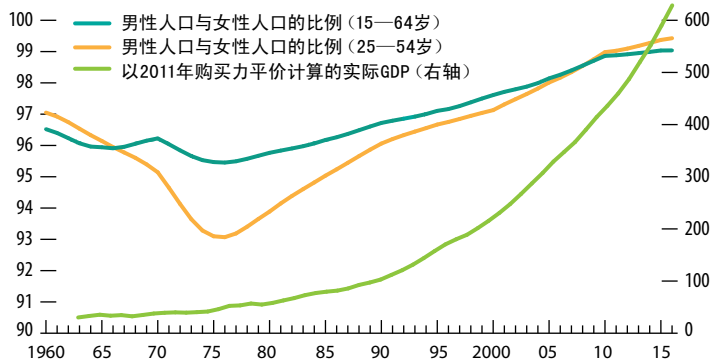
经济革新旨在通过鼓励私人企业、取消价

图4
越南战争的影响

越南战争导致越南男性人口的相对下降，随着经济开始增长，所形成的劳动力空缺由女性填补。

(百分比)

(2011年GDP, 购买力平价)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格控制并逐步淘汰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述举措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贸易的开放，以及快速的城镇化。尽管过去女性劳动力中有很大比例从事农业工作（目前也是如此），但越来越多的女性工薪者加入庞大的服务行业 and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之中。

戈尔丁和奥利维蒂在其文章中表示，战后美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作者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提高，而技能较低的工作者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只在短期内有所提高。在越南，经济革新伴随着一项大力推动教育水平提高的举措，即全民教育(EFA)。首个全民教育规划(1993—2000年)强调在各级教育中实现性别平等。上述措施带来了不少好处，它使得战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再是短期现象。

在越南，高等教育中男性和女性的毕业率大致相同。越南是亚洲少数几个将受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别平等成功转化为劳动参与率方面的性别平等的国家。在越南，让高技能女性成功加入劳动力大军也得益于大量有关儿童保育和生育保障的法律，这些法律有益于家庭生活（见图5）。该国还强化了其法律框架，以保证平等和防止性别歧视。

路漫漫其修远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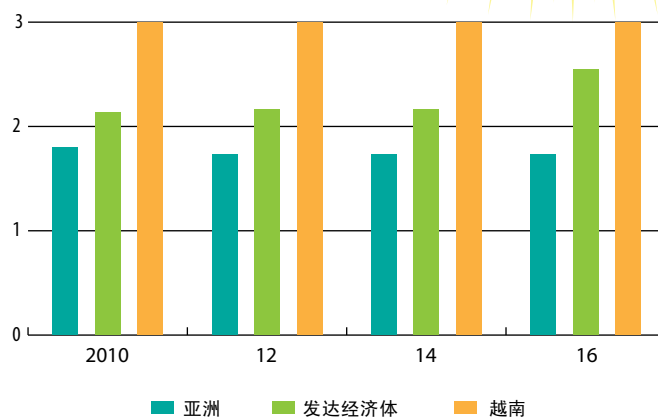
尽管亚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正在提高，但是在进一步改进成果并将良好的政策传播到亚洲所有地区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近取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周期转变，可能无法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起到支撑作用。随着老龄化和数字化的作用加速，近期所取得的进展也存在反转的可能。

如果我们对参与率数据背后的情况进行深入挖掘，会发现我们需要改善工资报酬差距、高级别的代表以及获得就业等其他维度方面的性别平等，包括越南等表现较好的亚洲国家也不例外。政策细节在不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差别，这取决于各国的发展水平、制度能力以及文化和社会规范。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以及家庭友好型法律的有效实施可能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图5
生育支持

包容的家庭友好型法律帮助更多越南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

(生育支持指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女性、商业和法律》(WBL)；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生育支持指数在1—3之间，其中1表示支持水平较低。指数是三个组成部分之和：(1)母亲在休完产假之后是否保证能获得相同的职位(1=是，0为其他情况)；(2)法律是否对产假有强制性要求(1=是，0为其他情况)；以及(3)由谁来支付产假福利(1=政府支付部分或全部产假福利，0为其他情况)。发达经济体包括21个除亚洲之外的发达经济体。亚洲包括：澳大利亚、柬埔寨、中国、斐济、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斯里兰卡和泰国。

那些保持强劲经济增长的政策也将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稳步提高起到支持作用。ID

安嘎纳·巴纳吉 (ANGANA BANERJI) 是IMF亚太部的高级经济学家，萨恩迪乐·赫拉茨赫瓦尤 (SANDILE HLATSHWAYO) 是该部的经济学家，阿尔贝·戈琼巴腊吉 (ALBE GJONBALAJ) 和安·凡乐 (ANH VAN) 是该部的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Acemoglu D., D. Autor, and D. Lyle. 2004. "Women, War and Wages: The Effect of Female Labor Supply on the Wage Structure at Midcentu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 (3).

Anh, J., Z. An, J. Bluedorn, G. Ciminelli, Z. Koczan, D. Malacrino, D. Muhaj, and P. Neidlinger. Forthcoming. "Work in Progress: Youth Labor Markets in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Goldin, C., and C. Olivetti. 2012. "Shocking Labor Supply: A Re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World War II on U.S. Women's Labor Supply." NBER Working Paper 1867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8.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Advanced Economies: Drivers and Prospect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April.